



应日本军方之命，犹太保甲在检查同胞的通行证。

这种朴素的友谊未及继续发展。二战很快结束，奥斯维辛的消息陆续流传过来，死者的名单被张贴在墙上，供幸存的难民检索。菲尔兹的父母双亡，欧内斯特·赫普纳没有在名单上找到父亲和妹妹的名字，他们至今下落不明。中国内战临近，犹太人准备起新的迁徙。四位访谈者获得了美国的签证，也有难民选择加拿大、澳大利亚以及新建的以色列国。少数人返回了起点欧洲。

五

影片的导演有两位：琼·格罗斯曼(Joan Grossman)，女性、犹太裔、美国国籍，完成此片时四十岁。保尔·罗斯迪(Paul Rosdy)，男性、无犹太血统、奥地利国籍，

完成此片时三十六岁。

制作《最后的泊湾》前后耗去四载，格罗斯曼往返于美国和以色列，罗斯迪在德国和奥地利查找线索。后一位把此片的制作过程比作拼图游戏，想来是指素材的庞杂和考据的辛苦。或者他也担心巨幅的拼图早已丢失了诸多单片，注定了无法弥补的残缺。如此看来，百科全书不过是只言片语，博物馆也仅仅收藏一枚简短的叹词。七十九分钟的纪录片苦心留住了些许光亮，逝者们的暗影反更觉深沉了。

导演保尔·罗斯迪访谈

问：你总共访问过几位过去的犹太难民？是如何找到他们的？

答：我们访问了许多过去的老难民。具体人数想不起来了，总之很多。他们有的在奥地利，有的在美国。还有一些通过书信联系，像在澳大利亚、加拿大和德国的旧日难民。大多数难民是通过别人介绍而找到的。我们先是读相关的书籍（最早是欧内斯特·赫普纳的回忆录）然后联系上他们的。另外，我们在奥地利和美国的档案馆里查了许多资料。我们的想法是：让观众有最直观的感受，所以我们只用个人亲历的第一手材料。那些受访者都愿意向我们回忆那段经历。几年

下来（这部片子前后花了四年时间），我们之间建立了非常好的友谊，并且直到今天还保持着。我很看中这样的感情。

问：影片中用了不少8毫米老纪录片的片段，谈一下好吗？

答：我们是花了不少工夫在老纪录片上。比如1938年一个美国医生拍摄的维也纳街景，都是反犹标语和被油漆污染的犹太店铺。还有美国的驻沪新闻机构在难民到来时拍的新闻短片。找到都不容易。

比较有意思的是一个叫查尔斯·布利斯(Charles Bliss)的犹太摄像师。他来上海比较早，曾在“上海柯达”工作，后来自己开了个工作室，给上海的富人和公司拍了许多8毫米影片。工作之余，他就去虹口拍犹太难民和普通的中